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要 目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

开发我们的精神宝库

党史资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彭泽中心县委建立的始末

中共修水县组织史资料

赣北特委暴动计划

赣北党史资料

2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1986

目 录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1)

开发我们的精神宝库……………万绍芬(2)

党史资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金 鉴(3)



中共彭泽中心县委建立的始末……………彭泽县委党史办(6)

杨岭山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永修县委党史办(10)

新四军都昌留守处……………都昌县委党史办(14)

新四军修水通讯处……………九江军分区党史办(17)

“江永”轮爆炸事件始末……………潘治富(19)

【问题研究】

试述红十军出击赣北的经历及其影响……………刘峰、定远、志华(22)

【组织史资料】

中共修水县组织史资料……………修水县委党史办(27)

【文献资料】

赣北特委暴动计划……………(32)



杨超传略……………德安县委党史办(33)

刘肩三传略……………邵天柱(36)

王环心、涂克群传略……………张红华(43)

邹觉民传略……………湖口县委党史办(45)

【经验介绍】

我们是怎样抓农村基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修水县委党史办(47)



努力开发精神宝库，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50)

随意编写党史资料影响恶劣……………(51)

赣北岷山根据地党史资料征编协作组第四次协作会在德安召开……………(51)

湖口县委办公室组织座谈《九江市党的活动大事记》……………(52)

瑞昌县委召开专业史工作会议……………(52)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

今年一月十二日，胡耀邦同志对冯文彬同志的一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开发我们的精神宝库

——为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红军之路》专题广播开播而作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万绍芬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江西《红军之路》采访组两个多月来，分别到江西籍老同志比较集中的北京、南京等地和省内各地以及老区广泛采访，录制和编写了一批专稿，这项活动目前正在继续进行，为今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明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作好准备。现在，这些稿件就要在省广播电台开办的《红军之路》专题节目中陆续播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加快老区建设步伐，振兴江西，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次《红军之路》的采访和宣传活动，是中共江西省委顾问委员会、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省老干部局、省民政厅和省广播电台等单位，为筹备纪念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而共同发起和举办的。江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江西从事过革命斗争，他们的英雄业绩将光照千

秋，永垂史册。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今天，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老区人民和全省人民一起，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正在为振兴江西作出新贡献。

在我们开发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开发我们的精神宝库，使革命前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崇高品德，成为全省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千秋万代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在这次《红军之路》的采访活动中，采访组在各地受到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老红军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忆革命的斗争历史，抒发革命情怀，并满怀激情地为江西人民题词、写诗、作画，这不仅丰富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宣传活动的內容，而且征集到了一批宝贵的党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的重要和珍贵。

在采访过程中，采访组带来了许多老同志对江西干部和人民深切的关怀和勉励，并对加快江西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王

(十转5页)

党史资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金 鉴

我认为要加快北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步伐，就要进一步解决党委的认识问题和发动党员的问题，解决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占什么位置的问题。只有使党委和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起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我们才能把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解决认识问题呢？首先要树立起这样一个观点：革命传统和党史资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党员都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子孙后代负责的

态度，为丰富这一精神财富的宝库贡献力量。这个观点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树立的基本观点。我们祖国有各式各样的财富、珍宝，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最贵重的珍宝呢？可以这样说，革命传统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是我们最贵重的珍宝。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党的历史记载着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六十四年来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这是成千成万的革命前辈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一段很光荣的历史，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能体现我们民族革命传统和献身精

*这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金鉴同志在北京市第四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的部分内容，题目是编者加的。

震同志说：“建设好江西，还是要靠江西的干部和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力更生精神把老区建设好。”康克清大姐高度评价了江西妇女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她勉励江西妇女和全省人民一道，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学习，奋发进取，作出新的贡献。杨成武、郭林祥、程子华、何长工、梁必业、黄镇、肖望东、杜平、黄玉昆、李贞等五十五位老同志在谈话中深情地回忆和赞扬了江西人民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希望江西人民继续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充分发挥江西的资源优势和精神宝库的力量，把江西建设好。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情深意切，语重心长，充分地表现了革命者

前辈对江西人民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最近，胡耀邦同志重访长征故地，在大渡河畔挥笔题词：“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壮举的赞颂，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新长征的激励和鞭策。我认为，这次《红军之路》的宣传活动，将是对我省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实际而富有意义的一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用革命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象我们的前辈那样，象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转自1985年第11期《江西党史通讯》）

神的一段历史。北京是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活动十分活跃，但是资料不全。现在知道这一时期情况的人极少，而且都已是八十几岁高龄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十年内战时期，北京市委被破坏了十几次，但党并没有被打垮，革命活动始终在继续。在白色恐怖的险恶情况下，北京的党组织始终没有停止战斗，这方面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征集。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活动的资料更多了。这些资料都记录了我们党的革命传统，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成为我们历史的教科书，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说，许多东西象彩色电视机的生产线和一些先进设备等等，都可以拿钱买到，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这就是革命传统。我们党几十年用革命者的鲜血，革命者的忠诚，用理想和纪律换来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把革命的传统传给我们的后代，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做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并不低于经济工作。因为经济工作是靠人去做的，要靠有理想有纪律的人去做。如果我们每天只抓经济工作，而不讲革命传统，不讲理想和纪律，经济工作也不可能抓好，如同前一段出现的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那样，不但不能给国家增加财富，还会给国家造成损失。而只有用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武装起来的人来搞经济工作，才能真正为四化作出贡献。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在北京战斗过，很多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在这里工作过，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留下的这些珍贵的资料真正挖掘出来。矿藏如不挖总还存在，而一些革命资料如不“挖掘”，随着岁月的流逝就会消失掉，因此我们要有

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指出“编写党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是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把这项工作看得相当重要，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其次，党史资料，革命传统，是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教育、纪律教育的生动丰富的好教材，也是今后对子孙万代进行教育的好教材。中央要求我们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就要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放在一定的位置，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加强理想、纪律教育之后更应如此。我认为在当前经济改革的形势下，强调理想和纪律，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我们现在搞四化，如果没有理想这个精神支柱，没有铁的纪律，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理想、纪律教育是具体的，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现在有些刑事案件增加，一个细微事情就可以引起恶性案件，这都是由于脑子里缺少精神支柱。当然，前一段的宣传，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报刊宣传所谓“现代人生的三部曲”，第一部，勤奋学习，第二部，努力工作，这两部都是对的，问题是第三部：尽情享受。人生的三部曲，最后的目的是尽情享受。这与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人生观不是一样吗？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是要把共产主义的事业坚持到底，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现在一些人往往把个人的生活追求，当成最高的“理想”，如果这样来教育青年，就是丢掉了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对青少年进行教育，革命传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要告诉他们无数革命先烈是怎样为革命而战斗的，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我们要用真实的材料、生动的例子来进行教育，就一定会很有成效。我举最近的两个例子：真正的“牧马人”——曲啸的报告，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反应是很强烈的。他们说：从曲啸的经历中真正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理想。再有，英模报告团在首都的报告也引起巨大反响，两个小时的报告，场内鸦雀无声，而且场场如此。这说明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是完全可以接受革命传统和理想、纪律教育的，认为理想、纪律教育不值钱了，失灵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思想教育这个环节，用丰富的革命史料，光荣的革命传统来教育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就可以接过革命的接力棒，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革命传统教育搞得很好，苏联用卫国战争中的红军事迹来教育青年，四十年没有间断过。比如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建了一座高达一百零七米、用六千吨水泥浇铸成的“祖国母亲”塑像，下面密密麻麻地刻着两万多名保卫斯大林格勒而牺牲的红军将士的名字，还用音乐模拟当时战场上的冲杀搏斗声，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此来教育青年不忘记法西斯的侵略，不要忘记红军战士的功勋。直到现在，许多苏联青年结婚，都要捧着鲜花到这里敬献，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北京团的系统去年搞学史建碑活动，对青少年的教育也是很深刻的。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台湾六十年代搞了一套一百卷的中日战争史，夸大国民党的作用，对我们进行污蔑和攻击。我们要澄清这段历史，把真实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就要靠大量的资料。就这个意义来讲，搞史料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小看这个事情。现在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健在，他们能讲清这些情况，如果过十年、二十年，熟悉抗日战争

的老同志不在世了，史料又没有整理好，我们的第四、第五梯队，能讲清这段历史吗？所以这是关系到子孙万代能不能继承我们的事业，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共产主义事业能不能延续下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这一点来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也不能不加快进行。

第三，党史记载了我们党六十多年的斗争历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具有极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冯文彬同志讲过，我们收集和研党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看到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党历来对党史研究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就强调，要搞好党史研究工作。我们要做好今天的工作，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昨天，预见我们的明天，要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找经验教训。这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中国是前天、昨天中国的发展和继续，只有懂得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中国。中国有两句古语：“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做现实工作也不能忽视过去。忽视过去就意味着愚昧和危险。我们党有六十四年的历史，我们回顾党的历程，搞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就是为了今天。现在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搞改革，中央领导同志常常提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工作。所以不能说搞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与我们现实工作无关。

通过说明以上三点，我们便可以认识到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性，从而真正把这项工作摆到其应有的位置上。

（转自1985年第12期《党史资料征集通讯》）

中共彭泽中心县委建立的始末

彭泽县委党史办

在赣北特委（后皖赣特委）的领导下，一九三四年六月由中共彭泽县委改组成立了中共彭泽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初设在彭泽浩山“伍龙庵”，后迁往岚陵、兆吉沟。红色政权一建立，即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等革命运动。一九三五年二月，由于重兵压境被迫撤离。中心县委发动群众，坚持公开斗争将近十个月，在皖赣边区的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浩山位于彭泽县城正东四十三公里。海拔八百余公尺。横跨皖赣两省边缘。东与安徽的东至（原东流、至德）接壤；南临波阳；东连都昌、湖口；北隔长江与安徽省的望江相望。山中层峦叠嶂，山下川溪交错，俗称“三十三道水，七十四道桥”，盛产竹、木、柴、炭、茶叶和粮食，获“金九都”、“银九都”的美称（清时称此地为九都）。这里虽资源丰富，得天独厚，但在封建统治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因此，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人民的贫困生活来看，都是当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二年，徽州工委领导的浮梁县委彭泽特支成员汪益之、李庚庆等中共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在彭泽地区活动^①。

一九三三年四月共产党员陈开运从圻、宿、太地区转到彭泽、经汪益之介绍会同李庚庆、曾道初、宛驼子、彭小鬼在彭泽浩山开展活动^②。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增多，一九三三年六月成立了中共彭泽县委会^③。陈开运为县委书记，曾道初为组织部长，阳旦初为宣传部长，李庚庆为军事部长，并建立了一支一百余人的游击队。县委会设在乔亭伍龙庵。在县委的领导下，浩山人民的斗争热情越来越高涨、革命影响越来越大。

（二）

一九三三年秋，国民党匪军大部分调往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后，在皖赣边境的兵力较弱。彭泽游击队在闽浙赣省红军游击大队的支援下，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④，彻底歼灭了盘踞在柳墅的县保安中队九十余人。其中六十余人被我击毙，十余人被我俘虏，只有中队长汪慕苏带了几个随从落荒而逃。计缴获步枪八十余支，机枪一挺，冲锋枪两支，手枪五支，还有不少弹药^⑤。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赣北特委决定将中共彭泽县委改组为中共彭泽中心县委。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在彭泽浩山乔亭欧阳林家成立。办公地点在伍龙庵。中心县委书记陈开运^{⑥⑦}。组织部长陈守华，宣传部长阳宽夫，县委秘书曾道南；少共中心县委

书记先后由阳旦初、田英担任。

中心县委的管辖范围是：江西的彭泽、鄱阳、都昌、湖口以及安徽的东流、至德和望江的一部分地区，约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十余万。

不久，中心县委迁至岚陵张村张谷女家办公。以后，又迁至浩山兆吉沟⑧。并在这里创办了招待处、看守所、医院、针工厂和兵工厂，还设有临时监狱⑨。从此，兆吉沟便成了指挥皖赣边七县革命斗争的中心。

中心县委的下属党组织有：

一、彭泽和至德未成立县委，由中心县委兼管。下设六个区委会⑩。第一区委书记周惜玉，第二区委书记阳贵林，第三区委书记周移法，第四区委书记叶瑞昌，第五区委书记兼区长张金生，第六区委书记张鹤年。

二、鄱阳县委⑪，书记李春生。靠近彭泽的地区设一区委，书记桂文志。并建有游击队（第五中队），后改名红色独立连，连长方步高（后叛）。县委会原设在清溪村，后移至舍里村。苏区范围扩大到五十余里。

三、都昌县委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县委书记蒋裕恒叛变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心县委派彭泽游击队指导员曹连洪带领游击队到都昌望晓源后，才成立了党支部⑫。

四、湖口新三区⑬。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心县委派军事部长李庚庆等赴彭湖边区的湖口棠山，开辟工作。按中心县委指示成立了湖口新三区（直属区）。区委书记李庚庆，区长喻柏林。区下面设立了四个行政组。

五、望江特区⑭。主要负责人潘品凡（后叛变）、夏进普。党员约二百余人。下设五个区委：第一区负责人李秀松，第二区负责人徐国华，第三区负责人徐发林，第四区负责人徐翰平，第五区负责人陈子勇。

六、东流县委⑮。县委书记谭绪言（化名兰进兴）、组织部长汪应癸、宣传部长阳巧兰、军事部长老田、少共书记孙××，县委书记方烈成。县苏维埃主席盛昌龙。县委下面设三个区，在彭泽与东流交界的沿江处设了特支。

（三）

中心县委一成立，即发动组织群众迅速进行了土地革命、培训干部和开展武装斗争、革命声势空前高涨。

一、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分地⑯。

为了使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翻身，中心县委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各县、区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一九三四年六月底，中心县委土地部在浩山召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大会。七月中旬，各县、区、乡的土地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广大贫苦农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东流县的香隅坂、中坂和永胜老屋农民纷纷烧契约、分田地。土地多的地区每人可分得两亩，少的地方每人也有一亩以上，对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家属则优先照顾。所分得的田除用竹片写上姓名插在田里外，并发给土地证作为凭证。整个红色区约分配土地万余亩。

二、举办短训班，培养干部⑰。

中心县委成立后，为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在彭坑举办了干部训练班。由徐昌年担任训练班主任。分期分批训练和培养干部。这对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六月，望江建立特区时，深感干部不足，就挑选了二十名青年学生来到彭坑训练班学习。东流县委的妇女干部，就是第一期结业的学员李三秀前往担任。训练

班的培训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学员的革命积极性高和求知欲强烈，许多不识字农民成了初识文化，懂得革命道理的人民干部，为革命工作挑起了重担。

三、开展武装斗争，反“围剿”保卫苏区^⑧。

彭泽中心县委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引起敌人极大的惊慌。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江西省伪保安处处长廖士翘任“剿共总指挥”，带领保安团来彭泽并配合伪三十六旅（七〇七、七〇八、七〇六团）、新七旅、安徽省保安旅以及各县反动武装，分几路进犯我浩山苏区。在这重兵压境的关键时刻，中心县委集中所有的地方武装力量，开展了反“围剿”和肃反工作。

肃清内部、一致对外。为了稳定内部，安定民心，中心县委派出区游击队先后镇压了乔亭村的伪保长阳祖户、六都方村的土豪方卿如，梨巴朱村的朱寿同。接着又前往至德青山桥消灭了反动组织大刀会和花篮会，缴获大量武器。同时，对党内出现的叛徒一经查出，立即惩处。这些有力的措施，对稳定民心鼓舞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深入敌后，牵制敌人。由于我们的力量不雄厚，我游击队即迂回到敌后扰乱敌人。一九三四年十月，我独立营一个连和两个区的游击队，共两百余人，前往彭泽县太平关打垮了县保安队的一个分队。接着又在黄土岭袭击江西省保安队，消灭了驻在村庄里的两个排，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手枪一支。在斗争中游击队还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

时改变战略战术，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如第三次在岚陵张村攻打七〇八团两个连时，敌人虽被我包围，但他们武器精良，激战两小时，未能消灭。针对这些情况，我游击队决定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攻心战，即在夜间潜入匪军驻地，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好，时而用爆竹代替机枪，时而开枪射击，闹得匪军彻夜不安。以后，每隔一、二晚搞一次。从此，敌人日夜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众寡悬殊，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如一九三四年，望江党组织组织的“十月农民暴动”，因叛徒金狗仔告密，未成功。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就大肆搜捕我党人士，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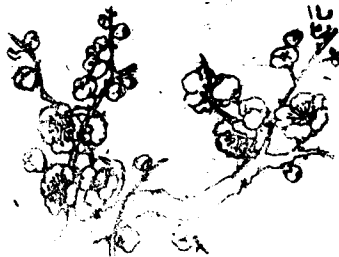
（四）

一九三四年底皖赣分区独立师在至德大板桥与敌新七旅遭遇受挫，皖赣特委大部分人员也同时撤走。我浩山根据地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敌人重兵压境和强制并村的情况下，中心县委和武装力量被迫于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撤离浩山苏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⑨。少共中心县委书记田英领导的手枪队，在都、湖、鄱、彭四县交界的武山和彭泽的老山一带活动^⑩。不久，在都昌望晓源村成立了都、湖、鄱、彭中心县委，接替了浩山的革命火炬，转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八六年三月

注 释：

- ①《徽州工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廿九日）
 - ②杨恩来回忆录（一九五九年）
 - ③⑥⑩⑬原中心县委第四区委秘书汪绍喜的回忆（一九六〇年八月八日）
 - ④走访曾广礼谈话记录（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
 - ⑤⑦《闽、浙、赣来人占关于皖赣边及皖南的报告》（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写十二月八日交到），走访陈祥元谈话记录（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
 - ⑧⑰走访原第六区少共书记曾冬应记录（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五日）
 - ⑨走访原看守所看守员洪根发记录（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 ⑪《皖赣特委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鄱阳县的有关情况》
 - ⑫走访原警卫班战士石学高的回忆（一九六〇年）
 - ⑬走访莫德林、周义先记录（一九六〇年元月廿四日）
 - ⑭⑱走访徐雪洲（化名徐振国）《望江十月暴动前后》（一九六〇年）
 - ⑮⑯《谭绪言谈东流县委情况》（一九六〇年十月廿一日）、王锯桃《关于东流、张溪、香隅地区斗争的回忆》一九六〇年）
 - ⑲⑳浩山乔亭村原苏区干部座谈记录。（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 ㉑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许登寿《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曹连洪同志给都昌县委的信》（一九六〇年）
-



楊岭山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

永修县委党史办

楊岭山地处永修县之西北，扼南浔铁路，南与云居山隔河相望，东有南九公路，西与湘鄂赣根据地毗连，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散居在这里的客籍户较多，曾有八省七十二县之说。一九二七年，湖南“马日事变”后，一些幸免遇难的共产党人，汇集到这里，利用楊岭山的地理环境和客籍户较多，便于隐蔽的优势，建立了地下党的组织，开展了游击斗争，成为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南浔铁路特区党委的建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共永修县委在栗山坂被破坏止，坚持斗争达两年零七个月时间。

一、党组织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永修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楊岭山一带竟成了白区。曾在湖南宁乡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梅冶成和在湘西开展游击斗争失败后的共产党人徐上达等一些共产党人，相继到这里来。他们一方面以教书、挖煤、打柴、种田，营谋生计，就地隐蔽；一方面仍和党中央或宁乡县党组织保持一定联系。一九三二年七月底，在白槎一带的新老党员已有十多人。为了把这些党员组织起来，八月一日晚，徐上达等人在黄育才家里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成立中共南浔铁路特区委员会，推徐上达为书记、黄育才为组织委员、蔡海涛为宣传兼军事委

员，高锦成为工农运委员、易春廷为妇运委员、龙汉初为青运委员。并下设河坪、白槎、临圻寺三个支部。

“路特区”的成立，使大革命失败之后一度“寂静”下来的永修西北部又重新在党领导下进行斗争。

二、党组织的发展

一九三三年五月，徐上达通过梅冶成的关系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取得联系。六月二十日左右，徐上达从上海汇报工作返回永修，在区、支联席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中央执行局关于将中共南浔铁路特区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永修工作委员会，推选工农分子负工委主要责任的指示，但联席会议认为，当前宜先整顿党员队伍，自下而上的改选支部，然后再行改组。因此，改名为工委会后，只对个别领导成员作了调整，书记仍为徐上达，组织仍为黄育才，宣传尹泽南，农委易春廷，军委蔡海涛。

工委成立后，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党员达五十四人，其中第一支十五人，第二支二十三人，第三支十六人。还成立了青年团、妇女部、交通处、军事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工委奉中央局的指示派高锦成、罗振武到闽浙赣省红军第五分校学习，还派喻中阳到上海领取《红旗

报》和毛泽东同志在全苏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宣传教育材料。

八月，工委根据中央局推选工农分子负主要责任的指示，改选黄育才为书记，徐上达改任组织委员。

一九三四年一月，永修工委再次派徐上达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和请示工作。为了便于指导，中央决定将永修的党组织转移给闽浙赣省委领导，并调徐上达到中央局组织部工作。

徐上达从沪返永修后，即赴各地支部报告中央的意图和指示。二月三日，工委又行改组，黄友云任书记，尹泽南任组织，喻中阳任宣传，胡开祥、高礼堂、何金香为执委。黄育才、易春廷离职去闽浙赣红军第五分校学习。这时党的组织已发展到八个支部六十五名党员。

二月二十二日，高锦成和罗振武两同志在闽浙赣省红军第五分校第六期政治连学习结业，由闽浙赣省委派回永修负责工作。几天后，交通员送来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信，决定将中共永修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闽浙赣永修特区委员会，并任命高锦成为书记，罗振武为军委主席。

二月二十六日，永修特区委在山前傅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由八人组织，其中书记高锦成、组织尹泽南、宣传喻中阳三人为常委；另五名执委是：工运高礼堂、农运黄友云、军运邱文烈、青运胡开祥、妇运龙汉初。

特区委建立后，仅三个月，党的组织就发展到十个支部、十个特支共一百五十三名党员。分布的地区有栗山、三溪桥、白洋坂、东固、黄家岭、汤家垄、河坪、青树港、杉山、越山、涂家埠、驿南、山前傅、抱桐树、刘家坪、长泥垅、马坳、白槎街、木港郭村、

邱山沟、下黄金洞等，在永修境内上下九十余里，左右四十余里。占据了大半个县，还在南浔线上的黄老门和德安设立了两个特支。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根据斗争需要，闽浙赣省委将永修特区委改为中共永修县委，并派邓志青来永修工作，同来的还有第二批在闽浙赣学习的易春廷、黄育才二人。他们到后，即依省委指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改选了领导班子，邓志青为书记、高锦成为副书记、尹泽南为秘书、易春廷为组织部长、喻中阳为宣传部长、万海秋为青年部长、罗振武为军委主席。并调整了党的组织结构，县委下辖四个区委：第一区委书记杨金玉，第二区委书记李国清，第三区委书记谢少连，第四区委书记夏子清。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永修县委接到中央十月三十一日发出的《为开展游击运动给皖北永修两县委的指示信》。月底县委书记邓志青随中央派来的交通员一起赴沪汇报《指示信》的贯彻情况，中途因与交通员失去联系，未找到中央，返回湖北黄梅时被捕。不久，县委改选喻中阳为书记。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本日晚，喻中阳、高锦成、易春廷和湘鄂赣来的少共王同志四人在栗山坂开会，不幸被地主邱华芝带领反动武装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喻中阳中弹牺牲，易春廷受伤被捕，高锦成、少共王同志分头冲出重围，后高锦成被迫只身潜往外地，王同志也返回了湘鄂赣。至此，永修县委和党组织遭到破坏。

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白槎一带的党组织从建立之时起，就把建立武装，开展斗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一九三三年九月，工委特派高同志在瑞昌寻找红军来帮助成立游击队。一九三四年二

月，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闽浙赣省委指示永修特区委要迅速开展游击战争。为此，特区委派出罗振武、梅少云、邱文烈等到涂家埠、尖山、三溪桥等地的伪保安队中去进行兵运工作，还派高礼堂到土匪史宗贤的队伍里做争取改造工作。

罗振武到三溪桥伪保安队后，秘密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尹泽南的配合下，策动一个班的团丁举行了起义。没几天，土匪史宗贤的队伍在高礼堂的策动下，与起义军会合。这两支队伍共有四十多人，三十多支枪。于是便成立了“永修工农游击大队”，尹泽南为大队长，高锦成副大队长，邓志青为政委。大队下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罗振武，指导员尹泽南（兼）；第二中队长梅少云，指导员喻中阳；第三中队长史宗贤，指导员高礼堂。

永修工农游击大队成立后，以杨岭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威胁游击队安全的是当地的地主武装。当时杨岭山附近有两股地主武装：一是以彭立生为首的虬津联保靖卫团，有四十多名团丁、三十多支枪；二是李辉胜为首的枹桐树联保靖卫团，有三十多名团丁、二十多支枪。特别是李辉胜的靖卫团离杨岭山不过三华里，对游击队威胁更大，因而，游击队决定首先消灭李辉胜。

六月二十二日，伪永修县保安团派来一个排约二十余人与李辉胜联合，企图消灭我游击队。游击队决定先下手为强，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在保安团到达的当夜十二时，由尹泽南带领三十多名队员，直奔李辉胜家。敌人旅途疲乏，晚上又吃了李辉胜的酒宴，正在酣睡，被打得蒙头转向，四散奔逃。不到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敌排长一人，团丁十多人，俘虏四人，获枪二十多支。

次日傍晚八时，我游击队又乘胜攻打虬

津彭立生的靖卫团。彭立生因接到永修县保安团“枹桐失守”的通令，加强了防范。游击队两次攻击未克，于是改变战术，引蛇出洞；只留几名队员佯攻，大部分队员隐蔽山后，两名队员在街上放枪。彭立生在碉堡里听见街上枪响，以为我游击队在打土豪。即命令全部团丁出碉堡反攻，几名佯攻队员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北山上，埋伏在山顶的游击队员一齐冲下来，敌人被打得乱作一团，落荒而走。我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活捉了彭立生父子，打死团丁数名。

游击队除了独立作战外，还经常配合湘鄂赣红军作战。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湘鄂赣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舒金提带领一个挺进队和一个游击队共六十多人来杨岭山与我游击队会合，协同作战。在红军的帮助下，我游击队在战斗中进一步壮大，到八月底，发展到一百余人，八十多支枪。

九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五千多兵力对我杨岭山游击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我游击队南渡修河，主动跳出敌人的包围，进军云居山，在真如寺进行整训。不久，敌人发现了游击队转移到云居山一带，立即包抄过来。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趁敌人还未发起进攻，撤离真如寺，向张公渡方向突围，打垮了敌人的堵截，又回到了根据地杨岭山。

这时，杨岭山四周都驻有白军，形势紧张，白军在游击根据地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抢劫焚烧无所不为，搞得老百姓日夜不安，熟透了的谷子也没有人去收割。在这紧要关头，县委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将游击队分成若干小队分散到各地，白天上山休息，晚上帮助群众抢收，打的粮食都藏在山头、垄尾的窖里。还经常在晚上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白槎街

的一个敌兵营，在屡遭游击队打击之后，每天下午太阳还有一丈多高就缩进碉堡不敢出来。

敌人见硬的军事“围剿”不能打垮我游击队，便使出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委派叛徒孔荷宠(曾任红十六军军长)任湘鄂赣边区招抚特派员。孔到永修后，两次派人向我游击队“招安”，无耻地委任尹泽南为某旅旅长，高锦成为某团团长，但尹、高二人以坚决的态度回击敌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永远要保留”，使敌人的“招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

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不久，政委邓志青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大队长尹泽南又病重转去上海治疗，游击队在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中，虽挫败了敌人多次的进攻，自身也遭到重大的伤亡，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县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喻中阳在栗山坂牺牲，副大队长高锦成虽幸免于难，但也无法开展活动，只好只身潜逃外地。从此，这块坚持贰年零七个月之久的据点，被敌人占领了。但是，党在这块土地上创立的不朽功勋，光辉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执笔 曾宪顺)

附：主要参考资料

1. 《江西永修军委蔡海涛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2. 《江西永修工作委员会蔡海涛报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
3. 《江西永修徐上达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
4. 《江西永修来人徐上达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
5. 《江西永修报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6. 《江西永修特区委书记高锦成报告》(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7. 《江西永修特区委书记高锦成报告》(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8. 《永修特区党组织散布图》(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
9. 《中央为开展游击运动给皖北永修两县委的指示信》(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10. 高锦成《给吉水县委领导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
11. 《访问高锦成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
12. 《访问徐上达同志谈话记录》(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13. 《访问尹泽南同志谈话记录》(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14. 罗振武《给徐上达、尹泽南的信》(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
15. 罗振武《给永修县委的信》(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16. 吕正雷《给永修县委的信》(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

新四軍都昌留守处

都昌县委党史办

新四军都昌留守处^①，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南方红军游击队收编组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善后事宜，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中共皖浙赣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都昌建立的工作机构（对内仍称都、湖、鄱、彭中心县委），管辖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四县，隶属于景德镇办事处（对内称赣北特委）^{②③④}。都昌留守处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正式成立，同年四月上旬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而终止。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同志带领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从都昌县大港曹百四出发，到达浮梁瑶里受编后，陈毅同志和皖浙赣省委书记李步新同志动员田英留下，到新四军驻都昌留守处工作。田英带着陈光林、石书新、丁大倪、郑玉太、刘国均等同志于一月下旬旧历年前回到都昌，在大港街上借石抵如（地主）原做店铺用的空房子，设立了“新四军都昌留守处”^⑤。二月初，田英以留守处主任的身份请大港街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国民党都昌县常备自卫大队驻军和乡公所的负责人，以及有名气的大户商人）吃饭，正式公开地亮出了“新四军都昌留守处”的牌子^⑦。

都昌留守处管辖的范围主要是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四县。这个留守所在形式上

是为了方便新四军景德镇办事处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实质上是为了加强我党对这一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因此，在留守处内部秘密建立了中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田英任中心县委书记，谢文山、华永标、戴其明、苏远全、邵荣兴、石书文等为委员^⑧。

都昌留守处共约十六人。田英、陈光林（田英警卫员）、刘国均（亦称四班长）、郑玉太（伙夫）等常驻留守处公开办公，丁大倪（中心县委秘书）、华永标、邵荣兴（一名老曹）、戴其明、苏远全、石书文等，则秘密或半公开地分别驻彭泽、鄱阳、湖口和都昌的张岭、蔡岭一带开辟工作^⑨。中心县委利用留守处这一合法机构，坚决执行原皖赣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规定的各地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以及中心县委的任务^⑩，做了以下工作：1. 秘密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各级组织，如彭泽的严家山、陈家港两个区委；湖口的沈贞里、陈梅里两个区委；鄱阳的一个中心区委和两个支部；都昌的大港、张岭、徐埠、马涧桥四个区委和六十二个支部，共有党员二百余人。2. 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田英等同志与驻地群众关系密切，“礼尚往来”，不论哪家有“红白喜事”，他们都主动前往送礼问候，并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讲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深受群众的爱戴和好评。3. 争取一批爱国人士到统一战线中来。留守所

处通过广交朋友、广泛宣传，使回乡兴办教育事业的江西省知名人士李幼农、国民党第三区区长应自强和第三区中心小学校长程致远，以及大港街的知名人士石经选、曹光朝、曹松高、熊江楼等，都与留守处的关系较好，并积极主动地宣传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了留守处工作上不少的支持和帮助。4. 为准备日后发展抗日游击队之用，筹备了一笔资金。如大港街的谢明礼、熊江楼、谢明仁等都各自捐了一至三百元（银元）^⑩。

新四军都昌留守处公开建立以后，国民党当局表面承认，暗中蓄谋破坏。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电令各县曰：“……本省各级共党部队业经奉令……改编……限于本月底以前完全开拔离赣待命；近查各地间有不逞之徒假借共产党之名……蓄意破坏抗战工作……亟应严厉裁制……”^⑪。藉以寻找阴谋破坏的口实。国民党都昌县政府从县常备自卫大队中派一个分队驻大港街的名曰“执行防务”，实则监视留守处的活动，分队长冯观涛表面伪装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拥护，仍和留守处的人员“合作”得很好，经常与田英相邀品茶、尝酒和抓鱼，骗取了田英对他的信任^⑫。

田英同志原名胡望生，报到上面的备案的新四军都昌留守处主任亦是胡望生。但在一般称呼上仍是用田英这个名字。当时，游击队员崔洋翰，受编在浮梁途中因害怕艰苦逃回湖口，假造田英的私章和文件，在乡下向豪绅要米，国民党当局便以此为口实，开始了卑鄙的阴谋活动。国民党湖口县政府即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报告“田英仍在乡下打土豪及分谷^⑬。国民党省政府遂借口“查无

田英其人”，电令“仰即将其歼灭”^⑭。四月六日清晨，国民党都昌县常备自卫大队副队长李运辉率二、三两个中队，湖口县第三区区长张旭晖率一个区分队，加上驻大港一个分队，共约三百余兵力，突然将留守处团团围住。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留守处七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邵荣兴（一名老曹）当场中弹身亡；丁大倪、刘国均（系宿松人）和郑玉太（乐平人）被俘让李运辉亲手枪杀在敌碉堡前的操坪上；田英、苏运全、陈光林三人也因子弹打光被俘，于七日下午被解往狮子山下枪杀了。留守处的财物也被抢掠一空^⑮。

田英同志被害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该地区加强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四月二十日，国民党都昌县常备自卫大队部发布令^⑯各队与区后备队会哨游击，以严防田英党羽窃发的训令^⑰，彻底否定了新四军都昌留守处的合法地位。四月十日，华永标、戴其明、老许、老张、老陈等赶到大港曹百四村，召开了中心县委（扩大）紧急会议，决定老戴和老许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老张去景德镇办事处，汇报情况，请示下步工作。但不幸，去皖南的老戴和老许在彭泽杨梓桥投宿时被敌人杀害；去景德镇的老张途径鄱阳石门街也遭敌人杀害。至此，都湖鄱彭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新四军都昌留守处也随之消失^⑱。

新四军都昌留守处被破坏和田英等同志的被害，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特别是根据地人民无不感到悲痛、惋惜和感慨。党中央《新华月报》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和一九四一年一月，先后为此发表过社论和消息，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正抗议。

（执笔：殷育文）